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孤悬敌后的坚固堡垒

■ 单宏宇 周一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武汉陷落后逐步开辟的。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敌情变化,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根据地武装力量转战多地,根据地名称也多次更迭,如“豫鄂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豫皖边区”“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等。按照其主要部分所在和历史表述习惯,本文统一称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带,最初以河南竹沟、鄂中汤池、鄂东七里坪为三大支撑点创建,后逐步发展为东起太湖、西至荆襄、北临舞阳、南接洞庭的广阔区域,横跨豫、鄂、皖、湘、赣五省,成为党在华中敌后创建的重要战略基地。由于该根据地在各个方向上均未直接与其他根据地相邻,孤悬敌后,面临日军、伪军、顽军的重重围堵与多面“绞杀”,生存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但从战略布势来看,这里物产丰富、群众基础较好,我军依托该根据地既能向多个方向灵活出击,又能对日伪华中核心地区武汉形成战略包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坚固堡垒,区域性的作战影响力不容小觑。

备战养马畈,扬威鄂豫边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共地方组织即在鄂豫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39年1月,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部署,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向武汉外围地区挺进。他们一面规避敌顽的侵扰,一面在沿途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多支地方武装和开明士绅,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5月,游击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队、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上旬,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一部和竹沟留守处干部50余人编入挺进团。随后,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1大队到达京山县大山头,与中共鄂中区委领导的应城县抗敌自卫总队第3、第4支队会师。

6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会议,从思想、组织、武装等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会议首先统一思想,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下一步斗争的中心任务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标准;其次,会议完善各级组织,成立了以陈少敏为书记的新鄂中区委,下设2个特委和各县县委,使全区工作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最后是强化武装力量。根据中原局“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的指示要求,会议决定将豫南、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整编,组建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

养马畈会议的召开和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成立,标志着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不仅实现了统一领导,还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具备了多方向出击、扰乱敌后战略纵深的能力。6月下旬起,游击支队各团队在信阳、应山、罗山、云梦等地频频

出击,给日伪军造成极大困扰。10月13日拂晓,日伪军出动数百人,从京山县贾店、罗店等地出发,偷袭驻京山县新街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因我军警戒严密,敌军刚出动即被我流动哨发现并鸣枪报警。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1团队以第2大队在正面阻击,以第1、第3大队从两侧进攻,三面逼近敌军,将其包围在新街以南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内。战至傍晚,被围日伪军在援军接应下方才逃脱。这是新四军挺进鄂中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不仅重创敌人,也树立了军威,提振了武汉周边地区军民的士气,就连国民党报纸也作了突出报道,公开肯定新四军战绩。1939年11月,新的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随后,挺进纵队南渡汉水,转战侏儒山、京山坪坝等地,打击了武汉周边的日伪力量,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政权。



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的新四军第5师纪念馆。 资料照片

队,协助群众组建改选委员会,而后组织民众大会进行投票选举。选举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采用举手表决,有的在被选举人脚下插旗,有的在其身后的碗里投黄豆。无论形式如何,都真实体现了选民的意愿。

二是针对有国民党旧政权的敌后地区,根据地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有利于人民的改造。尽管部分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其武装力量从事反共活动,但在抗战大局下,仍有部分开明士绅或国民政府县、区长认同我党抗日主张,与附近新四军协同作战。对于此类政权,若单纯采取民选方式将其更换,可能造成局部统一战线破裂,适得其反。因此,边区党委采取更为温和的建政方式:帮助其完善民主机构,肃清辖区内匪患,建设自卫力量等。如此一来,不仅消除了他们对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威胁,更增强了团结抗战的力量。

三是针对伪军、顽军、新四军等多种力量共同存在的边缘区,根据地通过多种方式建立“白皮红心”的多面政权。这类地区通常敌情威胁较大,难以建立稳定的根据地,以往多通过边区党委部分领导的个人关系进行争取,但效果有限且风险较高。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逐渐分散,其多次“扫荡”均被新四军粉碎,战略颓势日益显现。借此契机,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派出多支小型工作队或游击小组,在这些地区秘密建立农民救助会、妇女救助会等群众团体,将其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主要媒介,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抓手。

鏖战侏儒山,战略围武汉

1941年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由李先念担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其主要任务是在鄂豫边区坚持抗日斗争。成立之初,该师下辖3个旅和2个游击纵

队,兵力达1.4万余人,在新四军各师中绝非弱旅。然而,该师活动于武汉四周,地跨5省边区,处于日蒋重兵对峙的险恶环境中,且长期远离师部、孤悬敌后,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避免作战被动局面,第5师按照上级指示,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分批次、分区域向敌后挺进建立根据地,最终逐步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5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同年6月,该师以主力部队进入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直逼武汉市郊。该部采取各个击破、逐步拔点的战术,开辟了汉孝陂抗日游击根据地。

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武汉周围日军调动频繁,各据点兵力减弱。第5师决定乘机进一步作战略展开,开拓新局面。为造成战场包围武汉的态势,第5师决定首先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该区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的三角地带,物产丰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是武汉的西部屏障。但驻扎在此的日军并不多,主要依靠伪军守备。考虑到此地日伪据点稠密、易于相互增援,第5师决定采取“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首先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其中1个敌人据点,尽量缩短战斗时长,不给敌军前来支援的机会。

12月7日,第5师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从汉阳肖家集、索河出发,分两路奔袭驻守侏儒山的伪第1师第3团团部。通过对伪军的争取,第15旅顺利通过敌军3道岗哨,直扑团部所在高地,未发一枪即成功俘获该团部100余名官兵。战后,第5师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全部释放,此举对周边伪军产生强烈震动,此后不断有小股伪军主动投诚。在随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第5师继续发起多次攻势,几乎全歼伪第1师主力,并成功击退日军数次增援。侏儒山战役胜利后,川汉沔地区伪军士气彻底崩溃,纷纷向武汉方向溃逃。我军乘势控制汉阳、沔阳、汉川间大片地区,初步开辟川汉沔根据地,为第5师后续向襄西、襄南发展创造了前进阵地。

随后,第5师又先后开辟和恢复了赣北、襄西、襄南等多处根据地。至1943年9月,该师成功进入石首江北地区,并逐步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委改称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并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5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成为党在华中敌后领导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到抗日战争胜利时,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完成了收复失地,解放人民、直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任务。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单响手枪“独撅子”

■ 徐平



八路军使用的“独撅子”。 资料照片



新四军使用的“独撅子”。 资料照片

“独撅子”是一种民间土法制造的手枪。该枪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打完后还要将握把向下掰开退出弹壳,再重新装弹,因此又名“撅把子”“独一撅”“独角牛”“单打一”等。其枪管多为自行打制,有的用铁条盘成;口径不一,可发射手枪弹或步枪弹,部分有膛线,多数为滑膛。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小型兵工厂甚至个人都能自制这种手枪。比如,鄂豫皖军委兵工厂鼎盛时,可日产“独撅子”4支,几年累计生产该枪3500余支,成为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的重要武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就陈列多件此类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为满足抗日武装对枪支的需求,根据地大量制造这种“独撅子”,作为推广群众性游击战的重要武器,主要装备民兵和游击队。很多地方抗日武装,正是使用“独撅子”打击敌人,缴获武器,进而发展壮大。

此外,“独撅子”在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中也有少量使用。根据一份1943年1月4日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通知

没有那么多驳壳枪,而“独撅子”可以轻松藏在身上,就成为武工队大量装备的主要武器。由于“独撅子”外观粗糙,使敌人容易生锈,看起来就像一块破铁。因为这种武器实在不像枪,日军还因此吃过亏。

据一名侵华日军回忆,1945年刚加入伍的他和几个新兵奉命在胶东周村抢粮食,突然被打了冷枪,一人手臂中弹。他们四处搜索,抓到了一人,从他身上搜出一把掰开的“独撅子”。可是这几个日军新兵都不认识这种土法制造的手枪,就问:“这是什

么?”那人沉稳回答道:“这是做木匠的工具。”日本新兵看着这个粗糙不堪的铁块,没有想到这是枪,便扔还给他,背着抢来的粮食,扶着伤兵走了。回到部队,向小队长汇报,他们每人都结结实实吃了一记耳光:“什么木匠工具,那个就是枪,你们这群蠢货,放跑了八路!”待他们追回去,那名八路军战士早已撤离。

链接历史

1931年7月1日,国民党军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国民党军会进行第三次“围剿”,但没料到国民党军在遭受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只隔了1个月,又发动新的“围剿”。因此,当敌人开始进攻时,红军尚未进行新的反“围剿”准备,正分散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且未得到充分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余人。

面对新的“围剿”,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命令分散在闽西广大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向苏区中部地区集中,待机破敌。7月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回师集中任务。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高兴圩地区进行短期休整,进行反攻作战准备。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接到红12军军部的报告,得悉敌军主力正向兴国方向疾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据此,红一方面军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以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地区时,发现敌军已抢先赶到富田。根据这一情况,红一方面军当即决定改变计划,令各部悄然折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随后几天,各路敌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西有赣江,南、北、东三面有敌9个师进逼,形势十分严重。各路敌军中,向良村、莲塘前进的敌第3路进击军2个师的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红一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由高兴圩地区向东突进,求歼向莲塘前进的敌第3路进击军,而后向北进击,求歼第3路进击军主力。具体部署是:以第4军、第3军团、第7军攻歼敌第2旅;以第3、第12军(欠第35师)为预备队。

当晚,红军第4军、第3军团、第7军秘密密向敌接近。7日拂晓,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总攻击令。激战至9时,将敌第47师第2旅及由良村西出侦察的1个多营全部歼灭,击毙敌旅长,取得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到这次战斗时,感慨地说:“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莲塘战斗旧址。 资料照片

补丁军装里的誓言

■ 马金平 马忠达

“红军财产,个人保管”,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红军干部用生命践行的誓言。这8个字,就写在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锡龙军装的领口。1933年春,张锡龙深入连队检查训练时,作训参谋注意到他的军装破旧不堪,手肘处棉絮外露,肩头补丁叠着补丁。参谋当即为他申请了一套新军装。

张锡龙得知后,不仅没有接受,反而立即退还新军装。当晚,他在煤油灯下铺开那套旧军装,取笔蘸墨,在领口内侧一划一划写下“红军财产,个人保管”8个字。第二天在全师军人大会上,他指着军装说:“我们红军的每一份财产都属于革命事业,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领导干部只有保管使用的权利,绝没有特权享用的资格!”

这番话很快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印证。1933年冬,张锡龙率部转战闽西山区。部队在严寒中艰难行军,朔风凛冽。警卫员见他只穿着单薄军装,悄悄找来一件缴获的棉大衣。张锡龙发现后厉声批评:“前线伤员比我们更需要保暖!”他当即命令将大衣送往野战医院,自己则蹲在田埂边,仔细地将稻草搓成细绳,一圈圈缠在军装里御寒。战士们看到这一幕深受感动,纷纷效仿,部队士气不降反升。

同年12月,张锡龙在指挥江西黎川团村战斗时,同黄克诚并肩在前沿阵地指挥,黄克诚的眼镜被敌人子弹打碎,张锡龙立即用自己的军装补上,黄克诚感激地说:“张锡龙,你真是一位好军长!”张锡龙自豪地说:“黄克诚,你真是一位好军长!”